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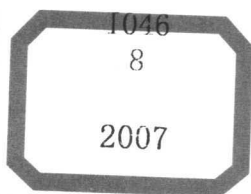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A Study of Zhou Zuoren as a Translator

翻译家周作人论

刘全福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A Study of Zhou Zuoren
as a Translator

翻译家周作人论

刘全福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家周作人论 / 刘全福著.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0416-1

I. 翻… II. 刘… III. 周作人(1885~1967)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78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张以文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19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500 册

书 号: ISBN978-7-5446-0416-1 / H · 0176

定 价: 14.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王宗炎 (中山大学)

刘重德 (湖南师范大学)

主任委员:

庄智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中国海洋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委员: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张佩瑶 (香港浸会大学)

张美芳 (澳门大学)

汪义群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罗选民 (清华大学)

郭建中 (浙江大学)

郭著章 (武汉大学)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

谭载喜 (深圳大学)



总 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国自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并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



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III

总
序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众说纷纭：周作人翻译研究综述	2
第三节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其他	8
第二章 翻译思想、翻译理论及翻译实践综述	13
第一节 从“益智”到“移情”	13
第二节 “直译意译，圆满调和”	16
第三节 “直译”而非“死译”	19
第四节 翻译理论的重新梳理	22
一、旧话新说	23
二、“名从主人”的音译	25
三、童话的翻译	27
四、宏伟的翻译计划	29
五、翻译工作的专业化	31
六、重译问题及其他	32
第三章 日本文学：历史与现代的选择	34
第一节 明治前后的文学	35
第二节 “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之发达”	42



第三节 短歌、俳句及其他	45
一、短歌与俳句	46
二、《古事记》及其他	49
第四章 希腊遗风：矢志不渝的追求	52
第一节 从《〈红星佚史〉序》到《关于卢奇安》	53
第二节 从《红星佚史》到《卢奇安对话集》	64
第五章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益智”、“移情”与“人道主义”	70
第一节 “新生”甲编和乙编	71
第二节 俄国文学：“思潮奋发”之源	74
第三节 波兰文学：“悲凉激越”之气	77
第四节 匈牙利文学：“神思挺拔”之势	79
第五节 芬兰、丹麦及其他弱小民族文学：“文风渊朗”之声	83
第六节 “益智”、“移情”与“人道主义”	86
第六章 西欧文学译介：求其纯美的艺术观	88
第一节 走向英国文学的万花园	90
一、雪莱与拜伦：喜与恶的交织	91
二、布莱克：升华了的“人性”的神秘	96
三、斯威夫特：温婉中的犀利	98
第二节 漫步在法兰西文苑里	102
一、直面福娄拜、莫泊桑师徒	103
二、左拉：为人不及的写实与“露骨”	104
三、波德莱尔：充满“异香”的“奇艳的恶”	105
第七章 杂学：毕生的胜业	108
第一节 杂学之始	109
第二节 神话与神话学：意在荒诞之外	110



第三节 文化人类学：杂学中的杂学	112
一、民歌与童谣	114
二、医学史与妖术史	116
第四节 日本风俗与民情：另类的宗教	118
一、风俗与民情	119
二、江户风物与浮世绘	121
三、川柳、落语与俗曲	123
第五节 儿童学与童话学：进化论的教育观	128
第六节 生物学：观照人类行为的标准	136
第七节 性心理学：中庸为取舍之道	142
第八节 佛经：文情与“义谛”并重	146
第九节 外语：不是杂学的“杂学”	147
 第八章 携手共竞译业：周氏兄弟翻译比较研究	151
第一节 携手共竞译业	151
第二节 求同存异的翻译思想	154
第三节 “求信”、“达旨”的直译原则	161
第四节 各有千秋的译文特色	167
 第九章 结论	170
第一节 周作人翻译研究的意义	172
第二节 周作人翻译研究展望	175
 附录一：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焦点透析	179
附录二：发“新潮”于“旧译”——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 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对我国传统文论的消解与重构 ...	194
附录三：周作人译事年表	204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38



第一章

绪论：“一个巨大而 复杂的存在”

第一节

引 言

20 世纪前半,时代际逢沧桑之变,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批学界先驱以其旺盛的精力和天才般的创造力为后人留下了众多不朽的鸿篇巨制,他们或著书以陈己见,或译介以传人言,这的确是一个呼唤巨人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而这一时代所造就的学界巨子不仅有着难以遏制的再现自我的话语意识,即若在传递他人思想方面也表现出了不可压抑的强烈欲望。

周作人就是一位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问大家,而且同鲁迅、郭沫若等许多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坛巨匠一样,周氏也曾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沐浴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也曾直接或间接地经受了时代潮流的涤荡,这一切过后,他也最终走上了著译生涯,并将几近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翻译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以成就而论,同辈人中能望其项背者实可谓屈指可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周氏曾为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拓荒者和代言人之一,尽管他毕生著译煌煌千余万言,若论其之于后世的影响,则似



乎并没有像同代人那样被赋予应有的历史地位。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遍观国内近几十年来业已付梓的现代文学教材或研究专著,能将周作人重重写上一笔者实在是寥寥无几,再随手挑出任何一位稍有影响的现代文学作家,便可轻而易举地检索到厚厚一册或数册相关的研究资料,而对于周作人,情况则大不相同了。

然而这又是一个可争的事实。正如陈子善先生所言:“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周作人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徐舒虹, 1999:1)的确,周作人的存在无疑是“巨大”的,因为他曾与鲁迅一起被誉为五四文坛上的“周氏兄弟”,又曾与胡适、鲁迅齐名,被尊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三大巨人之一。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的存在又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性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亦实属罕见。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位集众多矛盾于一身的人物:他著译丰厚,本当以鸿儒相称,但却一度为国内学界所不齿;他曾是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坛骁将,民族危亡之际竟演绎出附逆丑闻;他生性笃实,温良敦厚,却与众多文人结下恩恩怨怨,打过不少的笔墨官司;他中庸为道,崇尚闲适的士大夫生活方式,暮年则于“穷”、“病”、“闹”中不得善终……也许正是由于这些难以找到契合点的矛盾,后人论之,每每必有裹足,即使偶尔涉笔,也多为反衬,不乏微词,至于翻译,则更是鲜有人提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周氏均堪称一位当之无愧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在 60 余年的文学翻译生涯中,他曾与兄长鲁迅一起提出并倡导过先进的翻译理念和思想,他酷爱译业,成就卓然,且孜孜不倦,译风严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这样一位并不多见的学者型翻译家,全面而客观公正的梳理与评价工作将为当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不可小觑的参考与借鉴作用。

第二节

众说纷纭:周作人翻译研究综述

最早关注周作人翻译活动的是日本学界。1909 年 3 月,周作人与



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在东京出版,同年5月,当地印行的《日本与日本人》杂志第508期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在读的是俄国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张菊香、张铁荣,2000:79—80)

尽管只是一则短讯,该文实际上已具备了一定的研究性质,它将周氏兄弟对法国等欧洲国家文学作品的自觉阅读和翻译活动置于当时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学进行整体接受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以褒扬的语气对周氏兄弟不乏开拓意义的译介成就及倾向作了简要的评述,因此可视为关于周氏翻译研究的发轫之作。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样的呼应毕竟太微弱了,而且又是来自遥远的异域,它只能一定程度地说明域外对于我国“西学东渐”现象的敏感态度,至于影响一面,充其量不过是在周氏翻译研究这块处女地上刚刚立起的一块不甚显眼的界碑,若论真正的奠基工作,则要推到十几年以后了。

1923年2月,《申报》50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胡适的《最近之五十年》一文,文章对周作人的翻译活动和译介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评述。胡适首先肯定了林纾在以古文翻译小说方面取得的业绩,而随后则笔锋一转,指出这样的成绩到底还是归于失败,究其缘由,大致因为古文毕竟是死的文字,无论做得如何出色,究竟只能供少数人赏玩,既不能行远,且难以普及。接着作者又举了周氏兄弟翻译的例子:“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他引用了周作人所译安徒生童话《安乐王子》(通译《快乐王子》,笔者注)作为例证,并分析指出:这样的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



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江义华，1998：111）还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对周作人继《域外小说集》以后的翻译则给予了不菲的评价。他指出：北欧的易卜生、安徒生等，东欧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库普林等，以及新希腊、波兰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在这一年之中都介绍进来了，而“在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少有人仿效，是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同上：153）

胡适为文，虽非针对周氏一人，亦非专论其翻译，但大家出言，立论总不乏新颖独特之处，因而能探幽发微，时有灼见，也是自然的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胡适一向被认为是学界无可争议的执牛耳者，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正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就此而言，这篇文章虽略带点评的性质，仍可以视为周作人翻译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影响于后来者自是不可小觑。

的确，胡氏以降，论及周氏翻译者虽称不上趋之若鹜，却也不乏其人，比如五四时期的钱玄同就曾有过如下评述：

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意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诂”的办法，强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官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来的翻译中，是开新纪元的。^①

这里论者间接地批评了严复、林纾等人为了求“达诂”而用古文翻译外国作品的取道，以此来反衬出周作人一贯恪守的“直译”标准的可贵之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毫无讳言地启用“开新纪元”一语来作为对翻译家周作人的定论性评价，由是可见周氏于当时译坛毋庸置疑的独特地位。

胡适、钱玄同从宏观的角度对周作人的译事及译绩作了整体性评价，至于评价是否客观公正，尚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我们认为，

^① 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一件要事》，载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6期。



既然胡、钱二氏均与周作人过从甚密，因而理应熟知周氏一贯的文风和译风，故此可以认为，对于周氏的翻译，他们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此外，作为当时文坛举足轻重的圭臬人物，他们也理应深谙时下相当敏感的学术氛围：评鹭他人，无论褒贬，过与不及均有可能动辄引发笔战，微词四起。如此推断，可以认定上述评价理当是客观公正的。

胡适、钱玄同之后，相关评价日渐增多，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评价大都带有点评的性质，且东鳞西爪地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书籍，既没有形成研究的规模与气候，也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因此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若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风气的形成，则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国内学术环境日渐宽松，作为周作人整个研究课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周氏翻译研究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在这方面，卓有成就者不在少数，如郭延礼、李景彬、张铁荣、王锦厚、陈福康、舒芜、倪墨炎等知名学者均在自己的研究专著中对周作人的翻译活动、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与实践等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不乏一定的创建性，其系统性也远远超越了前人。然而由于各人学术兴趣、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研究范围的不同，上述学者探讨问题时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也不尽相同。大致看来，多数作者只是从某一方面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概括性论述，论述内容涉及周氏的翻译活动、所提出的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等等，整体而言，这些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尚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宽。

以深度和广度而论，则当以钱理群先生的研究为上。钱先生的观点主要见于《周作人论》一书，在该书中，作者专门设立一章，就周作人翻译问题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一、周作人代表了继严复、林纾以后的第二代翻译家，而作为这一代翻译家，他们“是以‘照原文直译’为旗帜的”，因此他们才“具有了自己的独立价值”。（钱理群，1991：226）

对于上一代的翻译家，周作人曾经是表示过感谢并给予充分肯定的。事实上，早年正是通过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他才第一次接触了西方先进思想，也正是通过林纾的翻译小说，他才产生了对于外国文学的极大兴趣，并在模仿中开始了自己早期的翻译活动，



因此应该说,上一代翻译家在周作人身上所起到的“媒”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媒”的作用却发展到了另一个方向,比如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周作人就发现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中的缺失之处,这种缺失在形式上表现为把外国人的著作都变成“载飞载鸣”的斑马文章,思想上体现为“以夏变夷”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而学生对于先生的背叛,“不仅是因为周作人这一代对外文的精通,使他们不必如林纾似的依靠别人的口译来做翻译,而是在翻译观念上、基本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同上:226)这种实质性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翻译对象与内容的选择上,同时也表现在由“益智”到“移情”的翻译目的的转变上,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一变化的结果终于在周作人身上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催化与催生作用。

二、假如我们对上述所谓的思想观念上的实质性变化做进一步的深究,即可发现周作人这一代翻译家所追求的以“存真”为翻译宗旨的最终指导思想。“存真”自然是为了求得西方文化的真实价值,并以此来改变令人困顿已久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借思想改造语言,又要借语言改造思想,注重于翻译内容的突破,力图输入真正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异质的现代思想。

这里钱理群客观地评价了《域外小说集》所具有的“存真”意义上的价值,指出它的付梓是介绍“被侮辱与被损害民族文学”的第一个自觉的努力,给其时的中国现代翻译事业注入了时代的青春活力,具有钱玄同所谓的“开新纪元”的意义。作者还对周作人五四前后的其他译介活动及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作为“古今中外派”的周作人通过翻译对于人道主义这种全人类“共通的精神”的宣扬不啻与世界文学潮流取得了共同语言的历史的期待。(同上:230)

三、关于翻译同语言发展的关系,作者指出,周作人先进的翻译观不仅体现在思想一面,而且还表现在对翻译与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辩证思考。在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看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语言形式的不同,实质上是反映了民族思维方式与感知方式的不同,表现了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同上:234)也就是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入新思想与新文学,更是为了促进民族的



思维与心理以及民族语言的改造,而我们也正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以周作人、鲁迅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坚持“直译”标准的深刻内涵与意义,换言之,正是在采纳新名词及语法的严密化这一点上,周氏兄弟所竭力主张的“直译”的翻译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周作人等对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的道路的历史否定,到他们有选择地将文言文成分作为现代翻译语言的有机组成成分,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现代翻译史上语言观的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

四、关于译者的自觉参与意识,作者指出,“周作人的翻译所引入的艺术世界存在着内在和谐与统一,这是翻译家主体对于作为客体的翻译对象的主观选择的结果,是主、客体的一种内在的契合。”(同上:237)周作人一方面坚持“直译”的翻译观点,但同时又强调翻译者主体在翻译活动中并不是绝对消极被动的,因为真正的翻译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契合,更要求译出原著的“神韵”,而要传达出作为作家全部个性的“神韵”,就必须达到“自我”与原文“化而为一”。

在这方面,钱先生一如既往地周作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译作能够自成独立艺术世界的翻译家是不多的,周作人即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以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为例,就表现出了周作人在寻求与自己主观心灵相契合的目标时所独具的慧眼;周作人以他优美的译笔,沟通了中国读者与在时空上迥然不同的国家的原作者的心灵,同时又提高了翻译文学的独立地位与价值,这都构成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独特贡献。(同上:238)

在上述几个方面的论证中,钱氏以独具的慧眼对周作人翻译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其观点新颖、鲜明,为他人所不及。

总之我们认为,翻译研究已成为有关周作人综合性研究课题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事实也正该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其他许多文学家一样,周作人也是由翻译走上创作道路的,更重要的是,对周作人而言,翻译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翻译活动不仅贯穿了他整个文学生涯的始终,而且还影响了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凡此等等,都说明将翻译家周